

新中国 70 年经济外交: 观念与选择

孙伊然

内容提要 建国 70 年来,中国经济外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经济外交反映着一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判断、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权衡排序,以及对战略意图之实施方案的选择。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经济外交的丰富内涵可以被归纳为一条简明的线索,即如何在特定的国际秩序背景下,以有效可行的方式寻求国家核心利益的实现乃至提升。中国在不同阶段特有的秩序观和利益观构成了关于决策背景和追求目标的理解,进而影响和塑造了关于具体路径的选择。

关键词 建国 70 周年 经济外交 国际秩序 国家利益 战略选择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DOI:10.13516/j.cnki.wes.2019.10.003

在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外交逐渐从边缘走向前台,所承担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愈益突出。时至今日,经济外交^①已成为中国总体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经济外交势必反映着一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判断、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权衡排序,以及对战略意图之实施方案的选择。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经济外交的丰富内涵就可以被归纳为一条简明的线索,即如何在特定的国际秩序背景下,以有效可行的方式寻求国家核心利益的实现乃至提升。

纵观 70 年中国经济外交,上述主线是清晰可见的,尽管具体政策和措施每每应时而变,但内在理路却恒常如一。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特有的秩序观和利益观构成了关于决策背景和追求目标的理解,进而影响和塑造了关于具体路径的选择。循着这一理路,本文拟对中国经济外交作一概括式的解读,我们首先回顾梳理 70 年经济外交的四个基本阶段,随后剖析其背后隐含的秩序观、利益观,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不同阶段战略选择的演进。

一、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阶段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经济外交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②:

第一阶段为 1949~1978 年。中国开始运用具有经济外交性质的若干措施,但经济外交的自觉意识尚不明确,相关行动的范围、力度也往往极为有限。在该阶段之初,尽管新中国外交的基本职能包括发展“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③,但实践中压倒性的重心则是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国家之间

^① 从既有文献来看,多数学者对“经济外交”这一术语的双重内涵是接受和认可的。例如,“经济外交的含义是在国际谈判中运用政治手段作为杠杆,以增进国家经济繁荣;或者运用经济杠杆,以增强国家的政治稳定”(Maaik Okano-Heijmans, 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diplomacy: The crossroa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nomics, IPE and diplomatic studies.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6, Iss. 1-2, 2011: 17.)。又如,经济外交“是关注经济政策问题的外交”,也是运用经济资源“以实现特定外交政策目标的外交”(G. R. Berridge, Alan James. A Dictionary of Diplom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91.)。还可参见:周永生. 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外交概念研究.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7)。

^② 这一分期沿用了张幼文研究员的判断。参见:张幼文. 70 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历史逻辑. 世界经济研究 2019(7)。

^③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595。

的经济合作^①,表现出明显的“一边倒”倾向。约从 1960 年开始,随着“一边倒”时代的结束,中国开始拓展经济外交的对象,其中又包含两个方向:一是设法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禁运,并与之发展经贸关系;二是以提供援助等方式拓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②。

第二阶段为 1978~2001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明确改革开放路线的同时,也开启了经济外交的新时期。这一阶段,中国明确表现出参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意向,并且以坚定持久的态度将这一意向付诸实践。这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身份,又在 1986 年提出复关申请后,经过长期谈判,最终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于 IMF、世行、关贸总协定(GATT)被公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中国在这些多边经济组织的成员国身份,无疑表明了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阶段性成就。至于双边、区域层面,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外交也有所进展,如向发达国家派出政府经济代表团以推动交往、促使美国放宽对华技术管制、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区域性经济机制等。有学者将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外交的特点概括为“接触性”“融入性”,即通过渐进式接触了解和学习国际经济规则^③。

第三阶段为 2001~2012 年。随着中国加入 WTO 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这一阶段经济外交的地位呈上升之势。在 2004 年的两次高层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且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上一个新水平”^④。次年,“全面加强经济外交”的表述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这些动向既反映出中国拓展海外市场的意图,也蕴含着对开放进程中不确定性及风险因素的警惕和防范^⑤。从具体举措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不仅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机制,同时也在区域层面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不仅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推动二十国集团(G20)治理机制的升级,还积极参与区域金融外交,如清迈倡议^⑥。

第四阶段为 2012 年至今,仍在演进之中。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层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等一系列经济外交重大战略思想,经济外交的新布局由此成形^⑦。其中,“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定位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既是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依托^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经济外交“奋发有为”的态势愈加明显,其所展现的战略性思维,既有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代表性与话语权的意向,也包含着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未雨绸缪式考量。从实践来看,中国在贸易、金融、投资等多个领域都加大了经济外交的力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⑨。

二、中国经济外交的秩序观及其演进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和判断,构成了经济外交决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更具体地说,所谓秩序

①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求是, 2014(7):9.

② 江瑞平.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外交评论, 2009(5):54. 中国经济外交战略考察——张曙光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文汇报, 2012-8-20.

③ 李巍, 孙忆. 理解中国经济外交. 外交评论, 2014(4):15-17.

④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举行. 人民日报, 2004-8-30. 龚雯. 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人民日报, 2004-9-3.

⑤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及“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人民日报, 2002-11-18.

⑥ 李巍, 孙忆. 理解中国经济外交. 外交评论, 2014(4):17.

⑦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求是, 2014(7):9-10.

⑧ 钟山. 实现商务事业新发展新提高新突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的重要思想. 求是, 2017(18):22.

⑨ 李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外交. 载张蕴岭, 高程主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07-212.

观即关于国际格局、本国定位、与主要国家及国际机制之间互动关系的看法^①。建国 70 年来,中国的秩序观应时而变,呈现为阶段性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冷战格局。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道路方面的相似性,中国在外交上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这一时期,在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各国间的经济合作迅速增长和深化。但中国并非该体系的成员,与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空间受到结构性制约。有学者指出,无论以地位还是意义来衡量,中国与苏东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外交均明显高于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其中与第三世界经济外交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目标^②。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国际格局和自身定位的判断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个真正大的问题,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知从“战争与革命”调整为“和平与发展”^③。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身份认同也发生转变,即从“体系外国家”变为“体系内国家”,从反对国际现状的“挑战者”变为大致认可国际现状的“维护者”^④。面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一时期中国采取了更加务实、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态度。在邓小平看来,美国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对象,中美建交“确实是个大局”。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对市场经济机制认识程度的深化和接受程度的提升,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找到了共同点,从而为全方位和平外交奠定了基础^⑤。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确立之后,中国开始推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⑥。

对中国经济外交而言,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是承前启后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秩序观稳中有变。中国对总体国际环境相对乐观的看法得以延续:在认识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乃大势所趋的基础上,提出了 21 世纪初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⑦。与此同时,面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及规则的不尽公正合理之处,中国试图以参与、改良的方式加以应对^⑧。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中国表现出对“义务承担者和渐进改革者”双重身份的认同,在其外交议程中,加速融入全球和地区经济的地位显著上升^⑨。经济外交由此成为实现上述意图、保障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对东盟的经济外交在这一阶段取得显著成效,双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⑩;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以经贸为纽带发展全面关系成为双方关注的重点”^⑪。

约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愈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秩序正处于“变局”之中。十八大报告在确认“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同时,亦提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以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并且指出新阶段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激烈”^⑫。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处于转折时期^⑬,该秩序及其主导国家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地区和地区秩序的重要性日趋明显^⑭。中国的崛起既是促成秩序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因为秩序转

① 这一界定参考了毛维准的观点。参见:毛维准. 美国国际秩序观: 特朗普冲击下的图景转向. 南大亚太评论, 2018(1): 53.

② 叶自成, 何林. 经济外交会议: 新中国的第一次. 世界知识, 2004(22): 56.

③ 宫力. 当代中国外交: 70 年的探索与启示. 国际观察, 2019(4): 11.

④ 时殷弘. 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国际政治研究, 2006(1): 35.

⑤ 宫力. 当代中国外交: 70 年的探索与启示. 国际观察, 2019(4): 10, 12.

⑥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求是, 2014(7): 9.

⑦ 中国跨世纪外交的光辉历程. 人民日报, 2002-10-10.

⑧ 十七大报告提出“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07-10-25.

⑨ 吴白乙著, 李丹译. 中国经济外交: 与外部接轨的持续转变. 外交评论, 2008(6): 19.

⑩ 王箫轲, 张慧智. 大国竞争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 东南亚研究, 2015(1): 27.

⑪ 张晓通, 解楠楠. 中国在中东欧的经济外交.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17(1): 179.

⑫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民日报, 2012-11-18.

⑬ 巴里·布赞著, 周桂银译. 全球性变革与国际秩序的演进. 外交评论, 2015(6): 17-18.

⑭ 阿米塔·阿查亚著, 傅强译. “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6): 14.

型而置身于更为复杂的局面中。就与主导国家的关系而言,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趋于明显^①,中国崛起被视为对既有秩序的挑战^②;随着中美国际位势的相对变动,对抗与遏制思维在美国秩序观之中的分量加重^③。就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言,随着全球增长重心的转移,中国与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④。中国已经意识到,距离全面崛起目标越近,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往往越多,在此背景下,经济外交承担着前所未有的重任^⑤。

三、中国经济外交的利益观及其演进

如果说秩序观涉及中国经济外交决策对国际环境的考量,那么利益观就直接关系到中国对不同属性、不同类型利益的权衡排序。经济外交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国家利益^⑥,这一点并无争议。但国家利益实为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⑦。具体到外交领域,每个历史阶段所寻求的利益内涵之中亦有主次轻重之分,需要作出梳理和辨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维护主权、安全利益的紧迫性远远高于寻求经济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影响所致。由于该阶段先后面临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霸实际上也意味着对国家主权、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维护。这一主旨自然反映在当时有限的经济外交活动之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中国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就本质而论,这些举措的目标在于实现政治利益,如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对恢复中国成员国地位的支持等^⑨。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经济利益的相对重要性开始上升,在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中受到更多关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外交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此相应,“经济因素在当代中国外交中的分量空前加大”^⑩。这一时期,中国综合运用经济和政治等多种手段来促成发展目标,实现国家利益;市场、资源、资金、技术等成为经济外交密切关注的对象^⑪。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外交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国家利益经济化、经济利益多样化”倾向。首先是国家利益的经济化倾向。吴白乙指出,新千年以来,中国外交目标的优先次序显著地向经济层面倾斜,“经济战略重于政治战略,外交成为扩大经济成果的工具”。更具体地说,经济领域的互补性推动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进展,“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则加深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关联^⑫。时殷弘将这一时期的特征概括为外交战略基本目标或者说国家利益的经济化,即: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对外政策本身,成为外交中愈加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首要部分;促进外部资金、技术、原料、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保障出口市场的开放性,成为传统外交目标背后的重要动机^⑬。其次是经济利益

① 时殷弘. 变更倾向和强烈动荡中的全球治理规则难题. 南大亚太评论, 2017(1): 16.

② 黄朝翰著,林发彬译.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正在浮现. 亚太经济, 2012(5): 6.

③ 毛维准. 美国国际秩序观: 特朗普冲击下的图景转向. 南大亚太评论, 2018(1): 53.

④ 卢峰. “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 新金融, 2015(7): 8.

⑤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求是, 2014(7): 10.

⑥ 常城, 李慧.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经济外交思想的发展历程. 学习月刊, 2011(4): 41.

⑦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 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参见: 中国的和平发展. 人民日报, 2011-9-7.

⑧ 宫力. 当代中国外交: 70 年的探索与启示. 国际观察, 2019(4): 4.

⑨ 中国经济外交战略考察——张曙光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文汇报, 2012-8-20.

⑩ 宫力. 当代中国外交: 70 年的探索与启示. 国际观察, 2019(4): 10.

⑪ 叶自成, 何林. 经济外交会议: 新中国的第一次. 世界知识, 2004(2): 57.

⑫ 吴白乙著, 李丹译. 中国经济外交: 与外部接轨的持续转变. 外交评论, 2008(6): 17.

⑬ 时殷弘. 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国际政治研究, 2006(1): 34, 37.

的多样化倾向。叶玉认为,中国加入 WTO 之后,多边经济外交的重心起初是在贸易领域,随后则向更多领域扩展,如金融、投资、发展合作等^①。

具有上述倾向的经济外交在这一阶段后期遇到了某些问题或者说瓶颈。融入世界经济在为中国带来重大利益的同时,也意味着相互依赖所导致的脆弱性。不仅如此,无论是经济一体化进程本身,还是借此成就贸易强国乃至经济强国的前景,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潜在的、国际政治层面的障碍^②。张晓通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长足进步,但这并非总能带来外部环境的改善;在大国互动、地区安全、经贸摩擦等问题上甚至出现了“实力上升、处境变差”的悖论^③。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为例,中国对该地区的经济外交不可谓不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盟成员国对于中国崛起的顾虑,但美国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重返东南亚等举措,使中国经济外交的效果受到削弱^④。面对类似问题,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优先的国家利益排序是否需要调整,在学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⑤。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见证了中国经济外交利益观的又一次转向。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外交明确表现出更趋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利益考量。十八大之后,经济外交确立了服从、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梦”的基本定位,确立了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既要注意眼前利益、纯经济利益、局部利益,更要注重长远利益、道义和价值利益、战略全局利益的指导方向^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⑦。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外交从过去“压倒性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转向“为促进国内发展与服务对外战略大局并重”。这一时期提出和启动的“一带一路”,其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合作,体现了经济外交“服务于对外战略全局的新特点”^⑧。在阎学通看来,外交目标从保障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转向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意味着国家利益排序的调整,即:外交中首要的利益考虑已不再是经济利益本身,而是从是否有利于民族复兴的政治角度来考虑对外关系和政策^⑨。

新时期利益观的转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随着实力和地位的上升,中国已进入必须注重全局性、战略性利益,而不只是经济利益的阶段。用王缉思的话说,一国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它如何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的总体方向^⑩。考虑到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目标,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和政治优势^⑪、将经济实力转化为经济收益和政治影响力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⑫。其二是外在形势与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专注于实现经济利益的做法越来越面临边际收益递减、外部约束趋紧的困境。

四、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选择与发展脉络

70 年来,中国经济外交在各个阶段展现为不同的具体路径、侧重与特征,但它始终是总体外交的一

① 叶玉. 中国的新多边主义经济外交.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17(1):18.

② 蒂莫西·希斯著,刘霓,杨莉编译. 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进路. 国外社会科学 2017(1):158.

③ 张晓通. 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 外交评论 2013(6):49.

④ 王箫轲,张慧智. 大国竞争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 东南亚研究 2015(1):30.

⑤ 阎学通. 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 战略决策研究 2017(3):4-5.

⑥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求是 2014(7):10-11.

⑦ 官力. 当代中国外交:70 年的探索与启示. 国际观察 2019(4):17.

⑧ 任晶晶. “双重转型”: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理念创新与战略布局. 载刘德斌主编. 中国与世界(第四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8-26.

⑨ 阎学通. 外交转型、利益排序与大国崛起. 战略决策研究 2017(3):5.

⑩ 王缉思. 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载王缉思主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4.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9.

⑪ 徐占忱,陈文玲. 论新时期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方略. 全球化 2014(7):35.

⑫ 张晓通. 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 外交评论 2013(6):54.

部分,反映着国家战略的基本意图。所谓大战略,即一国将其目标、能力及所处环境有机联系起来的指导思想^①。毋庸置疑,战略所包含的各要素之间应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理解不同时期的战略,需要在把握这种内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审视其实施成效和局限。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经济外交在国家对外工作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这一阶段,中国外交以政治、安全为主体,经济外交处于附属和边缘地位;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实践层面,外交都接近于单纯的政治外交或安全外交^②。然而,这一事实无损于当时有限的经济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一五”期间,苏联政府以多种形式帮助新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如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传授技术等;合理的工业布局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③。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领导人试图与苏联建立一种互利平等、而不是单方面依赖的关系^④。在这一时期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独立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得以建成^⑤。

从改革开放到 21 世纪初,中国经济外交表现出自觉意识上升、内涵更趋丰富、形式越发多样的特征。这一阶段,“以政带经、以经促政”的观念得以确立^⑥。从对象来看,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外交思想的对象所指已进一步明确和扩展为全方位范畴,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苏联与东欧国家^⑦。从领域来看,经济外交所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对外贸易领域的经济外交迅速发展,随后推进至与引进外资相关的领域。从层次来看,经济外交长期倚重双边层次的做法有所调整,开始更多关注在多边层次与主要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互动^⑧,试图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学习国际经济基本规则^⑨。卢峰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变化归纳为“内容多样化、对象多元化、机制市场化”,认为经济外交的战略调整获得了阶段性成功^⑩。不过,这一时期中国“以经济促外交”的实力还不够充足,处于起步和积累阶段;中国尚不具备大力开展对外援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资源和能力,也难以有效利用多边或区域性经济组织等平台来实现自身的外交诉求和政治利益^⑪。

以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中国有意识地加大了经济外交的力度。这不仅表现在各领域的具体行为,如能源资源外交的开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等^⑫,更体现于对待国际经济规则的态度和方式,即不仅要“加快熟悉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更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维护正当权益”^⑬。对此,有学者指出,随着参与国际机制程度的加深,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越发主动,“投资、援助、能源及技术合作和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规则的改革力度都大幅提升”^⑭。梅新育认为,加入 WTO 后的中国经济外交已进入“中级阶段”,其最大特点是“中国开始寻求影响国际经济规则,而不是被动接受现有规则”^⑮。应该说,经济外交的转变反映着这一时期中国总体对外战略“逐渐向进取战略演进”的趋向^⑯。

① 埃德温·温克勒著,年玥译. 大战略互动中的中美关系. 载王缉思主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5.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44.

② 江瑞平.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外交评论 2009(5): 53.

③ 李长久. 经济外交: 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平与发展 2000(1): 45.

④ Shu Guang Zhang. Beijing's Economic Statecraft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 ~ 1991.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39. 转引自: 牛军. 评《冷战时期北京的对外经济方略(1949 ~ 1991)》. 美国研究 2017(1): 142.

⑤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求是 2014(7): 9.

⑥ 中国跨世纪外交的光辉历程. 人民日报 2002-10-10.

⑦ 周永生. 邓小平经济外交思想初析. 北方论丛 1996(1): 42.

⑧ 江瑞平.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外交评论 2009(5): 54-55.

⑨ 李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外交. 载张蕴岭, 高程主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02-203.

⑩ 卢峰. “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 新金融 2015(7): 7.

⑪ 江瑞平.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外交评论 2009(5): 45.

⑫ 杨洁篪.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纪念新中国外交 60 周年. 求是 2009(19): 23.

⑬ 唐家璇. 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求是 2004(23): 6.

⑭ 吴白乙著, 李丹译. 中国经济外交: 与外部接轨的持续转变. 外交评论 2008(6): 19.

⑮ 辛秀. 中国经济外交 初级走向中级. 财经时报 2005-11-7.

⑯ 埃德温·温克勒著, 年玥译. 大战略互动中的中美关系. 载王缉思主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5.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57.

从效果来看,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外交的成绩可谓显著。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促成了中国与各大国之间利益交融的格局,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与这些国家之间总体稳定的关系^①。不仅如此,“以经促政”的外交策略还明显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推动了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的发展^②。郑永年等评价道,中国以经济外交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举措已在亚洲、非洲、拉美、欧盟等多地区产生影响,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③。然而,到了该阶段后期,经济外交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进入瓶颈状态,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有所弱化。如高程所言,尽管经济往来仍然密切甚至进一步扩大,但中国以经济手段在周边维持良好政治环境的效力却在下降,出现了“经济投入与政治收获不对称”的现象^④。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有其局限,经济外交未能提供安全方面的公共产品^⑤;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东亚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改变了中美邻的互动模式,进而削弱了中国周边经济外交的成效^⑥。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大国外交”的意识得以确立。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外交呈现出若干新特征。首先是经济外交的地位更趋突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需要“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来维护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经济外交就成为势所必然,如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多双边自贸区等均属此列^⑧。中国与拉美、中东欧等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进展^⑨。其次是经济外交的重心从参与规则制定更多地转向影响乃至塑造秩序。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成为新时期经济外交工作的合作愿景^⑩。中国开始尝试提出“新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主张”,其中,“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等由此成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⑪。再次是经济外交兼具进取与审慎的双重取向。一方面,与以往相比,新时期的经济外交更多展现出进取倾向,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同时整合、塑造经济和外交目标^⑫。另一方面,这些举措也包含审慎的、防御性的考虑。如“一带一路”在致力于塑造惠及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秩序的同时,也具有防止周边形成美国主导下的联盟体系、联手遏制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考量^⑬。类似地,中国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加快自贸协定战略布局、构建自贸协定网络的举措,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美国建立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所带来的压力^⑭。

上述新特征的形成与内部、外部条件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从外部来看,由于国际秩序处在转型之中,多边合作前景不明,中国有必要着眼于周边做好准备。随着 21 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力地位的消长变化,双方在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等关键问题上往往难以达成共识^⑮,全球治理在一系列领

① 高虎城. 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求是 2014(7):12.

② 高程. 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 国际观察 2015(7):36.

③ 郑永年,张弛. 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国中国软力量的观察.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7):11.

④ 高程. 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 国际观察 2015(7):36.

⑤ 王箫轲,张慧智. 大国竞争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 东南亚研究 2015(1):29.

⑥ 高程. 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 国际观察 2015(7):37.

⑦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人民日报 2014-11-30.

⑧ 开启中国外交新征程——王毅外长在“新起点、新理念、新实践——2013 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上的演讲. 世界知识 2014(1):31.

⑨ 崔守军. 经济外交视角下的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建设. 拉丁美洲研究 2017(3). 张晓通,解楠楠. 中国在中东欧的经济外交.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17(1).

⑩ 钟山. 实现商务事业新发展新提高新突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的重要思想. 求是 2017(18):23.

⑪ 高程. 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 国际观察 2015(7):40.

⑫ 宋国友.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经济外交新发展. 国际观察 2015(4):25.

⑬ 高程. 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战略. 国际观察 2015(7):40.

⑭ 李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外交. 载张蕴岭,高程主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207-208.

⑮ 符荆捷. 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的多边经济外交——从“英镑美元外交”谈起.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14(1):279.

域面临愈发艰难复杂的局面^①。置身于规则竞争渐趋明显、区域秩序愈加重要的局势之中^②,鼓励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国际经济体制改革、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③,就成为一种相对稳健的选择。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市场体量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使其具备了运用经济外交手段、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有学者指出,中国是诸多区域供应链或生产网络的集散地,在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已成为东亚和邻近经济体的增长引擎,其所发起的若干区域经济合作倡议更是强化了这一趋势^④。张晓通则认为,大国的经济实力以其国内市场为基础,通过主动开放、辅之以双边和对等开放的方式,大国经济外交能够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⑤。

中国经济外交的新阶段仍处在演进之中。展望未来,新时期经济外交的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点:首先是把握进取与审慎之间的平衡。许多学者都指出,在对外战略的具体实施中,需要谨防“战略透支”。时殷弘将其总结为心态、政治、战略层面的审慎^⑥。唐世平认为中国需要评估改变、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与风险,避免陷入过度的战略扩张和战略透支^⑦。阎学通认为中国设定的具体战略目标、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需要符合其实力基础,“不能以世界第一大国的实力地位来界定”^⑧。其次是把握地缘及方向上的平衡。如周永生所言,就中国的周边态势来看,很长时期内东部既是主要挑战的来源,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和利益方向^⑨。基于相似的考虑,时殷弘提醒道,“东进”与“西进”同为中国“战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而言,争取增进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吸取先进技术仍为必要之举;因此,在兼顾向西看与向东看的意义上,实现“战略经济”的内在平衡是未来的一大要务^⑩。最后是立足于国内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内中心任务的确定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⑪。国内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崛起的根基所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进也必然需要以此作为依托^⑫。全面深化改革、以高质量发展实现综合国力的升级,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进步性转型的基本条件^⑬,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继续取得各方面成就的根本保障。

(责任编辑:张薇)

① 时殷弘. 变更倾向和强烈动荡中的全球治理规则难题. 南大亚太评论, 2017(1):17.

② 唐世平著,宋菁菁译. 国际秩序的未来. 国际观察, 2019(2):30.

③ 黄益平. 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 国际经济评论, 2015(1):52.

④ 黄朝翰著,林发彬译.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正在浮现. 亚太经济, 2012(5):3-5.

⑤ 张晓通. 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 外交评论, 2013(6):59.

⑥ 时殷弘. 战略透支问题:历史经验和当今实践. 政府管理评论, 2017(2):44.

⑦ 唐世平. 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 中国社会科学, 2019(3):201.

⑧ 阎学通. 政治领导与大国崛起安全. 国际安全研究, 2016(4):9.

⑨ 周永生. 中国周边态势与经济外交反思.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2(2):44.

⑩ 时殷弘. 战略透支问题:历史经验和当今实践. 政府管理评论, 2017(2):47.

⑪ 王缉思. 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载王缉思主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4.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10.

⑫ 唐世平. 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0):202.

⑬ 时殷弘. 中国的周边战略与对美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 2018(6):30-31.

Contents & Abstracts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70 Years

Zhang Xiaoyu Liu Yongfu Zhou Jinlan(3)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mechanism between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long-term nonlinear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and short-term dynamic correlation mechanism of import, export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annual sample data from 1952 to 2018 by constructing a nonlinear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ion lag model and a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with stochastic volatil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equilibrium,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onlinear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import trade and output, in which the increase in export and import trade has less effect on the pull of output than its decline, and the export trade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output than import trade. Secondly, in a short-term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export trade growth has a positive pull effect on output in the whole sample range, while the impact of import trade growt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output at first, then rapidly turns to a negative inhibition effect, and finally gradually turns to a positive pull effect. Thirdly, at important time point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the accession to the WTO in 2001,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export trade showed a gradual weaken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hile import trade shows a gradual increasing promoting effec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intain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optimizing and upgrading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firmly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demand expansion, by replacing the factor-driven in the past with innovation-driven, so as to increase domestic demand driven growth, especially consumption-driven, and gradually shift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 to realiz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our country.

Logic Mechanism, Experience Inspiration and Future Orientation of 70-Year Financial Opening in New China

Guo Wei Si Menghui(15)

Over the past 70 years,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ha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both micro and macro fields. Financial open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financial reform and the pattern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tself, but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finance and realiz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four historical stages of early germination,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steady progress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opening up,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China's financial opening, summarize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financial opening.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nd risks in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fri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financial opening.

70 Years of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Views and Choices

Sun Yiran(27)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has witnessed different stages, and its importance in the overall diplomacy has continued rising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ional will, economic diplomacy reflects a country's cognitive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rank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choice of implementation plans for strategic intention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extensive content of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can be summarized as a main stream, which is, how to seek the realization and even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core interests in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way in the context of specific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unique views of order and interests at different stages constitute key understandings of the background and goals of decision-making, which in turn shape and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specific paths.